

郑观应救国思想的形成及对近代青年的启迪

□ 河北农业大学 高 晶 李红梅

摘要 在充满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勇于探索的救国志士,郑观应就是其中主张商战救国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启发了康有为、光绪帝、孙中山以及毛泽东等诸多革命人士,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键词 郑观应 改良思想 《盛世危言》 实业救国 影响青年

中国近代史是一段充满屈辱的历史,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一大批怀揣强国梦想的仁人志士积极探索着实现理想的途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席卷了中华大地。在人杰地灵的广东香山县便诞生这样一位揭开近代中国科学民主序幕以实业救国的思想家郑观应。

一、弃学从商 萌生改良思想

郑观应原名官应,生于1842年7月。父亲郑文瑞是一位“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丰,手自校讎,丹铅殆遍”的学者,虽然有读书的天赋,却没有中举的命,他一生都没能取得功名,以布衣之身在乡村设帐授徒。郑观应到了入学年龄之际,即就读于父亲开设的私塾中,期望能够圆父亲未实现的科举梦,这一读就是十年。

然而他的家乡香山县却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买办故乡”,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香山买办曾一度十分辉煌。同时,他的祖父郑鸣歧也是一位瞧不上“以寻章摘句”为能事的文人。有这样一位反传统思想的祖父,和一个崇尚经商致富的乡里环境,加上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故身为家中实际长子的郑观应(他的唯一兄长早年已过继给伯父),于1858年参加了香山县的童子试,首试未中后,便未再参加其后的四场考试,而是毅然放弃了学业,“赴沪学贾”。作出如此快速而坚定的人生去留选择,只能说是大环境熏染胜过小家庭影响,经商致富的吸引力强于八股取官的魅力。

1858年,郑观应来到上海,投奔叔叔郑廷江,这位于郑观应一生影响至深的“秀山叔”,一面为他找到了一份微薄收入的工作,一面十分热情地教他学习英语。第二年,郑观应通过一位在上海在洋行中已

几十年的发展,略有起色,但远不能达到支持长时间的战争,光绪的依赖人格则导致听从翁同龢主战意见,逞一时之能。最终导致甲午战争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割地赔款,“同光中兴”的历史局面因此戛然而止,为此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亡。

其次,戊戌变法期间,帝师翁同龢被罢官后,光绪过度依赖康有为等一批小臣,轻信改革三年可有起色,十年可图达成。在一百零三天的改革中发布了一百多道谕旨,但并不注重谕旨的执行力度,有名无实,一纸空文。同时,还匆忙裁撤闲散机构,但不考虑其人员生计问题,致使多人对改革产生不满情绪,最终到变法失败,民心尽失,成为清王朝衰亡的又一催化剂。

最后,光绪的依赖人格过度依赖翁同龢、文廷式、康有为、谭嗣同等,而对慈禧太后所信任的大臣李鸿章、荣禄等都过度疏远,帝后矛盾逐渐加深。戊戌变法时期召见日本前外相伊藤博文等关键的外交政治问题,光绪并不请示慈禧太后,而是擅自召见,使慈禧认为这是夺权的信号,帝后矛盾也自此愈演愈烈。最初是慈禧太后向天下公布光绪的病情,致使地方官员起疑,因为在专制社会中,皇帝的病情

有一定发展的亲戚、世交的帮助,进入一流的大洋行——宝顺洋行,作了一等买办的副手。在此期间,他曾跟随洋行中的洋人到天津考察商务,也曾与同乡一起到英国博士开办的夜班学英语,在洋行中得以顺利发展的同时,也为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说打下了基础。

离开宝顺洋行之后,郑观应即受邀成为和生祥茶栈的通事。他在宝顺洋行工作的十年间,就开始自己做一些生意,到了和生祥茶栈以后,更与他人一起出资,与外商共同经营公正轮船公司,不仅是其股东,也是董事之一,但却没什么实权,眼看着中国商人的投资,被英国人用作侵略权益的资本,他在心中燃起了反抗的火焰。

1873年,应原宝顺洋行麦奎因邀请,郑观应参与创办了太古轮船公司,并成为其总买办,他与船务总理晏尔吉,共同掌握着公司所有的揽载用人事务,由于他采用了一系列有效的经营之法,使太古发展十分迅速,开办伊始只有三艘旧船,后来逐年增添新船,并在各长江和沿海口岸,开设了多家揽载行,同时还向杂货和钱庄拓展生意。

他一边尽心做着买办,一边独自经商,此时的他无论是在经验上还是资本上,都已有了不小的积累。他在太古占股份,在轮船招商局也有投资,后来相继入股开平煤矿局,联合盛宣怀等企业家合资开采多地五金矿藏,主持集资建立造纸公司,投资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坐拥数万家财,成为民族资本家的同时,他在经济利益上也与外来投资者的矛盾日趋增大,于是他提出了中国人应自己开办公司和企业的观点。

他写作于19世纪60年代的《救时揭要》,主张“凡西人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庶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而成书于19世纪

是绝对的秘密,以证明天子的至圣至明,也为了统治的稳定。而后,慈禧太后又让光绪公开立嗣,昭告天下,致使所有地方官员看清了帝后矛盾的实质,在庚子国难时,以张之洞、刘坤一为首的地方官员私自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章程)》。光绪的依赖人格导致了帝后矛盾的公开化,也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从自身加速了清王朝的衰亡。

参考文献

- [1] 德龄.瀛台泣血记[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 [2]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
 - [3]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中华书局,1954.
 - [4] 艾里克森将整个心理过程分为八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存在一种“危机”,顺利地度过危机是一种积极的解决,反之是一种消极的解决。八个阶段分别是:基本信赖对基本不信赖(从出生到1岁左右);自律对羞怯与疑惑(1—3岁);主动性对内疚(4—5岁);勤奋对自卑(6—11岁);自我同一性角色混乱(12—20岁);亲密对单独(21—24岁);关心下一代对自我关注(25—65岁);自我整合对失望(晚年)。参见B.R.赫根汉《人格心理学》第六章[M].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和张雨欣陈仲廉《人格心理学第七章》[M].辽宁人民出版社,1977.
 - [5] 赵尔巽.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传八[M].中华书局,1977.
 - [6] 赵良.帝王的隐私[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 [7] 喻大华.因徒天子光绪皇帝[M].商务印书馆,2011.
 - [8] 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六列传二百二十三[M].中华书局,1977.
 - [9]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M].转引自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一)[J].
 - [10]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M].中华书局,2007年.
- ★作者简介:尤玉龙为齐齐哈尔大学硕士研究生;吴丽华为齐齐哈尔大学文史学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70年代的《易言》更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他在其中提出近代企业应由商民自办，建议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仿西方议院制度建立设议院，以期形成尧舜式的“三代制度”。这意味着，郑观应的改良思想开始萌芽，他逐渐偏离了商人的轨道，开始与仕途产生了联系。他的一句评价客观而中肯地总结了这一阶段的心路旅程：“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

二、命运多转 退著《盛世危言》

1878年前后，在直隶、山西等省发生了严重的灾荒，郑观应与众江浙士绅筹集资金赈灾，他甚至将自己母亲遗留的一千两银子也全都捐了出去，在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等人的力奏之下，朝廷授予了香山郑氏一族“乐善好施”的功德牌坊，并将这一事迹载入地方志。

与此同时，郑观应的经商业绩和《易言》的发表，都让李鸿章对他产生了好感。李鸿章曾饬令郑观应到天津“襄办堤工赈务”，郑虽因故未能到任，却让人看到了李鸿章对郑观应的青睐。郑观应自此得以与官僚集团产生了关系。

李鸿章的得力干将盛宣怀也多次与郑观应进行商业合作，两人关系相当不错。1882年，李鸿章从安徽老家奉召赶赴烟台，通知了盛宣怀，于是盛在李途经上海时，邀请郑观应一同前往迎谒，郑观应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李鸿章。

1878年，李鸿章批准了劣迹斑斑的道员彭汝琮请求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奏章，原因之一就是彭在方案中提出让郑观应担任襄办，可是不久，在彭汝琮问题不断的管理中，郑观应被迫辞职，织布局终至无法经营下去。1880年，李鸿章重新委派郑观应等三人筹建织布局，在不愿意去又想攀上李这一高枝的矛盾心理中，郑观应还是接受了会办的职务，不久被任命为总办，虽然后来由于多重原因，织布局毁于一场大火，但李鸿章并没有对他存下偏见。

1881年，盛宣怀在筹建津沪电线的时候，与李鸿章的副手、郑观应的同乡郑藻如再次向李鸿章力荐郑观应，于是5月，他被委任为上海电报分局的总办。这时的他掌着商办太古轮船公司的实权，兼任官办电报分局的总办，处于如鱼得水的状态中。

但是时隔几个月，唐廷枢、徐润等人就打破了他的这种自在局面。创办于1872年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当时遭到了外国轮船公司的联合排挤，在总办唐廷枢转向开平矿务局主持工作后，更从内部削弱了领导力量。因此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唐、徐等人向郑观应伸出了试探的橄榄枝。郑观应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之后，毅然放弃了在太古公司的优厚个人待遇，和在商办企业的大好前程，满怀一腔爱国热情，为争取挽回长江航运的权利，他接受了李鸿章委任的招商局帮办的职务。在他的努力下，招商局很快扭亏为盈，股票大涨，郑观应再接再厉，拟出十六条“救弊大纲”，增强了招商局的竞争能力，卓越的成绩使他很快升任招商局总办。

然而就在郑观应商途得意，仕途初露端倪的时候，1884年爆发了中法战争，矢志报国的郑观应自荐为抗法效力，于是与之共事多年，时任湘军营务的王志春，将他推荐给了新上任的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彭即于同年初将他调至广东军营，他在军中“知无不言，为无不力”。“不敢畏难，不敢避险，不敢言劳”，想要凭一颗爱国之心，干一场报国壮举。他帮助粤防当局从香港港督手中领回了被留难的25尊大炮，还打算到南洋联络亲朋好友，侦查敌情，密约当地壮士，袭击西贡的法国侵略者，但在彭玉麟的委派下，他还是留在了湘军十四营处理营务。此时，越南战场清军已是节节败退，郑观应于是被主战派的彭

玉麟派往西贡等地“体察情形”，并继而辗转于南洋各地，伺机谋求合纵抗敌的机会，但并没有成功。

1884年秋，法军攻占台湾，郑观应改派援台，他的任务主要是利用他在经商期间的人脉关系，办理军队的转运事宜。1885年初，当他途径香港转道汕、厦等地时，被太古公司借他推荐并担保的接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卷款逃逸一事拘留于港，一年以后才得解脱。而与此同时，上海机器织布局也因继任总办龚寿图挪用公款事发，诬陷郑观应经营不善导致亏损，致使郑观应借款赔偿了两万金，终以结案。

这两件事沉重地打击了郑观应，于是悄然退隐于澳门，消极地过着求道炼丹的日子。但一向积极面对生活的他，并不满足于现状，因此在懊恼隐居的同时，禁不住扩写《易言》，完成了体现他完整成熟维新思想体系的《盛世危言》一书。

三、救国思想 启迪近代青年

1894年，《盛世危言》一经出版，即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重印了20多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印刷版本最多的书籍。年轻的孙中山在1887年就读香港西医书院后不久，即与年长自己24岁的同乡郑观应相识，他与郑观应通过信件交流改革时政的意见，受郑观应的救国思想影响，经常撰稿鼓吹改造中国。他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文章，被郑观应修订更改之后，命名为《农功》，纳入了《盛世危言》一书中。他1894年苦心孤诣写成了表达自己改良思想的《上李鸿章书》，其中所提到的改良主义纲领，与《盛世危言·自序》中的表述如出一辙。

清廷的一些高官，如光绪的老师、礼部尚书、安徽巡抚都纷纷推荐给皇帝阅读。1895年，时年24岁的光绪皇帝阅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赞叹有加，特意命令总理衙门印刷了两千本，分发给臣工阅读。

1882年，24岁的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乡试落榜，在回乡途中经过上海，购买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也是他这次所购买的所有书籍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一本。从此，他的思想从中学向西学转变。1895年，他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大观点，其中最后一点基本就是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只是稍做了一些变通与完善。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叙了毛泽东对自己年轻时代阅读《盛世危言》时的一些感想，书中提到毛泽东十分喜欢这本书，在他记忆中，郑观应是一名老派的改良主义者，毛泽东非常认同他所总结的中国积弱的原因，“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在美国学者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也提到，毛泽东还在湖南老家务农的时候，就以将自己窗户遮盖以躲避父亲眼光的方式，阅读过这本书，他被这本提倡政治改良、呼唤技术进步的书所启发，产生了借鉴西方之长处，以拯救中国之文明的想法，这一念头促使毛泽东走出了韶山，为中国的前途到外面的世界学习更多的知识。此外，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从中受益匪浅。

正是这些当年深受郑观应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虽然郑观应本人只是一个改良主义思想家，但是他的救国思想经过进步青年人的过滤与发酵之后，成为了现当代中国发生的每一次质变的思想基础之一。基于此点，郑观应足以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理论家。

参考文献

- [1] 郑观应.盛世危言(上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2]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下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3] 邵健.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研究[C].华东师范大学,2012.
- [4] 夏东元.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J].学术月刊,1979(8).